

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五个儒家思想,可以归纳成三个大方面,即人与自然的...

“道法自然,天人合一”,这是习近平提出的第一个思想。何中华说,现代社会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大背景下,人与自然的相互矛盾日渐突出...

“习总书记提到的思想中,很多都涉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,即天下大同、和谐。”何中华说,商品经济强烈地诱发了人的欲望、贪婪,追求利益的最大化,这些都妨碍了人的道德感...

“重建道德,途径也很多,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传统文化中,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德本位主义,强调道德的至上性,强调人与人...

“居安思危”解决暴发户心态问题

习近平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,关于“安不忘危、存不忘亡、治不忘乱、居安思危”的思想。何中华说,这种思想恰好解决了目前国人的暴发户心态问题...

何中华说,西方现代化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,它足够的时间在文化上成熟起来,我们的现代化周期太短,几十年我们就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走向富裕了...

“居安思危”的思想恰好解决这种麻痹性。”何中华说,老子讲“物极必反”,好的时候要想到坏的时候,乐极生悲,这样的思想还有很多...

此外,何中华认为,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“集思广益、博施众利”是中国式的民主思想。“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该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,包括历代王朝的皇帝也有纳谏的传统。”何中华说,我们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包容性...

“这种包容性,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,对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选择——到底是全盘西化还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资源,还是非常有作用的。”何中华说,有人主张完全去掉中国格致传统,民本思想,完全把西式的政治模式移植过来,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,不可能成为零,一夜之间完全抛弃干净是不可能的...

何中华还认为,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想,体现了务实的态度。“比如躬行实践,脚踏实地,都是强调务实的表现。”何中华说,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提出中国梦,但是他还提出“空谈误国,实干兴邦”,虚和实是相互统一的,应该是结合在一起的。对一个事物也好,对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好,光有虚的东西不行,光有实的也不行。知行合一强调的是言行一致,理解的东西要落实到行动中去,经世治国和经世致用都是强调务实的方面,也就是实践的方面...

西方转而向东方文化找答案

目前,儒家思想一再被提及,不少人认为,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回归。对此,何中华说,在新的背景下,儒家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估价。“现在进入了后现代时期,而不同于现代时期。现代时期环境下,儒家思想是落后的,因为按照儒家思想,不能发展科学,商业,强调重义轻利,不能肯定自我的权利,而现代时期需要主体意识的张扬,所以儒家思想被打倒。”何中华说,而进入后现代时期后,人与自然的矛盾,人与人的矛盾日渐突出,自我迷失,找不到方向,这都需要有效的方法来解决。“儒家恰好有应对的有效因素,就是上述所讲的问题。”

何中华认为,人与自我的关系也是习近平提到的重要方面,而且是整个思想的精髓。“现在西方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化阶段,现代化的内在矛盾表现得非常突出了,那怎么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危机?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建文化上的自我。这就是我们东方人的文化身份、文化认同问题。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要安心立命,中国传统文化能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一个安心立命的根源,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。”

何中华说,至少从哲学和文化上来讲,世界发展到后现代时期,自我否定的东西越来越表现出来,所以儒家思想原来负面的东西,现在变成了正面的东西。“现在西方也苦于找不到解答的方法,转向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找答案。”

何中华认为,中国的软实力没有跟上硬实力的发展,还有些落后。“比如现在社会发展,但国人的民族德性、道德水准还落后很多。”何中华说,文化软实力才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,所以解决这个问题,弘扬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步骤。“越是民族的,也越是世界的,现在西方对中方文化也是很有兴趣,很多西方思想家把眼光投向中方,希望从中方的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。”何中华认为,应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,尤其在近代以来我们文化自信丧失的情况下,是十分重要的。

- 关于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的思想
关于天下为公、大同世界的思想
关于自强不息、厚德载物的思想
关于以民为本、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
关于为政以德、政者正也的思想
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、革故鼎新、与时俱进的思想
关于脚踏实地、实事求是的思想
关于经世致用、知行合一、躬行实践的思想
关于集思广益、博施众利、群策群力的思想
关于仁者爱人、以德立人的思想
关于以诚待人、讲信修睦的思想
关于清廉从政、勤勉奉公的思想
关于俭约自守、力戒奢华的思想
关于中和、泰和、求同存异、和而不同、和谐相处的思想
关于安不忘危、存不忘亡、治不忘乱、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



习近平15个传统思想背后的答案

9月24日,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,提出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”,并举出“道法自然、天人合一”等15个思想。

对此,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、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何中华将其分为“人与自然”、“人与人”、“人与自我”三个方面,进行了解读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俊其

法显：西行取经第一人

实习生 董兴生

你知道唐朝和尚玄奘,但你知道法显吗?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,习近平提到,“法显、玄奘西行取经,郑和七下远洋,等等,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动事例。”

其实,在玄奘法师西行前数百年,早有另一位僧人西行求法,那就是法显和尚。

据史料记载,法显和尚俗姓龚,生于公元334年,平阳郡武阳(今山西临汾)人。当时正处于东晋时期,法显三岁时就剃度做了沙弥,二十岁时受具足戒,正式出家。法显幼年时十分坎坷,三个兄弟先后夭折,十岁丧父,母亲随后不久也去世。

据说,法显自己也曾“患病将死”,被家人送到寺院,只住了两宿病就好了。父亲去世后,法显的叔父想劝他还俗,法显说:“我本来就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出家的,而是因为要远离尘世才入道修行的。”

东晋时期,佛教已经相当盛行。不过,佛教传入中国之初,佛经典籍多靠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来华传译。这多有弊端,“往往篇章不备”或者“转译失真”,日渐不能满足需要。因此,法显和尚发愿要前往西域、印度,寻求戒律原典。

公元399年,已是60多岁高龄的法显和尚踏上了西行求法的道路。这一走就是15年,共走遍了30多个“国家”。

法显与同伴由长安出发,取道河西走廊,一路向西。他们一路上穿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,经受了酷热、恶风的恶劣气候,一同随行的僧人多因伤病而死。可以说,法显西行的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唐僧师徒的“八十一难”。

东晋义熙七年,法显搭乘载有二百余人的商船泛海东行归国,途中耽误数月。第二年,法显再搭乘贸易商船,航向广州,最终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(今山东青岛)。

法显从长安出发时,已经是60多岁的“耳顺”之年,一路西行,经6年到达印度中部,停留6年,归程经狮子国等地,又3年才回到青州,前后已经过了15年,游历30国。每到一处,法显都要广泛搜求经律。这些佛教经典被运回国内后,法显到京都建康(今南京),前后译出《摩诃僧只律》四十卷、《僧只比丘戒本》一卷、《僧尼戒本》一卷、《大般泥洹经》六卷、《杂藏经》等,共计百万余言。

后来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后,再转往荆州(今湖北江陵)的辛寺,在此圆寂,享寿八十六岁。